

从严治党与从严治团:政治组织的结构性联动

■ 胡献忠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北京 100051)

【摘要】与西方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与其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在意识形态、工作范畴、队伍建设、接班人培养等方面形成密切的结构性联动,从而构成了由“从严治党”到“从严治团”的政治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列宁式政党的基因决定着党团梯队密切联动的运作模式,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生成了以党带团、以团助党的互动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党团如影随形、接续奋斗,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亟需党团从严治理、率先垂范。从根本意义上讲,实现政治组织间结构性联动,是政党增强整体性力量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从严治党 从严治团 政治组织 结构性联动 中国共青团

2017年初召开的共青团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大力推进从严治团,切实为党做好新形势下的青年群众工作。会议研究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从严治团的决议和规定。由此,“从严治团”成为本次全会最为闪亮的关键词,并被纳入近期共青团的重点工作之列,“从严治团”开始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鉴于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治关系,研究从严治团必然离不开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要求。政党及其青年组织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的时代产物,共产党与共青团这两个政治组织之间的结构性联动,蕴涵着深刻的中国本土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

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着群聚形态的多样性变迁:村落-部落-宗族-社群-国家。列宁有句名言:“要实现工人阶级的理想而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组织起来。”其他阶级或阶层也大抵相同。政党作为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只有当它从价值理论、政治纲领再到组织成员,都能赢得社会广泛认可时,才有可能掌控政权、巩固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今世界很多政党在完善自身结构的同时,都相当重视青年在当下和未来的作用,建有外围青年组织,如瑞典社会民主党有社会民主青年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青年翼、英国保守党有青年保守党。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与其青年组织的密切关系,体现在意识形态、工作范畴、队伍建设、接班人培养等领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不同寻常的政治关系。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而从严治团又是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人类文明发展中处于相当独特的地位,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收稿日期:2017-02-20

作者简介:胡献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常务副馆长,副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政治与群团发展、国家建构与青年运动。

一、列宁式政党的基因决定着党团梯队密切联动的运作模式

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告诉我们,政党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不仅产生了自己的政党组织,而且还产生了自己的工会、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列宁认为,党和这些群众组织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里,党是整合社会、动员社会的领导核心,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团组织的根本职能,就是助力马克思主义政党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斯大林认为,共青团和青年对于共产党的发展是有极大意义的,共青团是连接阶级和党的“第三根引带”。笔者认为,在当时苏联的“第一根引带”应该是工会组织,“第二根引带”是苏维埃政府。共青团在形式上是非党组织,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以与党同根同源的政治特色和鲜明的青春色彩,成为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纽带,即“第三根引带”。

与以职业类别特征聚集群众的工会、以性别特征聚集群众的妇女联合会相比,共青团是以年龄界限来聚集群众的,凸显了人类社会新陈代谢和代际更替的自然铁律。任何民族和政党都必须无条件遵从这一自然法则,于是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就尤为重要,共青团的梯队作用也就更为突出。诚如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青年团是由青年农民和青年工人组成的后备军,党利用它来充实壮大自己的队伍,同时它也是党用来影响青年群众的工具。工农年轻一代的千百万优秀代表在青年团的队伍里受到了教育和锻炼,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党、我们的苏维埃。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与共青团基本的关系架构和制度设计是合理的、科学的,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各行各业的青年在共青团带领下,围绕党制定的规划目标和任务忘我工作,使“共青团员”在社会上成为紧随“共产党员”之后的政治荣誉称号。至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苏东剧变,根本原因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权力掌控者的蜕变以及制度的具体运作方式偏离了正常轨道,没有将以民为根、以社会为本、以国家为用的角色与使命有机融为一体。不论是执政党,还是青年团,一旦脱离了基本群众,就必然为利益集团所绑架,甚至为裙带关系所异化;或者说正是因为利益集团、裙带关系的反向作用,才使原本与基层社会联系密切的政治组织自绝于人民群众。其实西方政党也一样,其合法性表面上是源自于竞争的胜出,但根子仍需植于民众的土壤之中。

毋庸置疑,列宁主义的政党原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定型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20年春,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建中共早期组织时,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吴廷康(俄文名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吴廷康一行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等人后,又前往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在京沪两地,吴廷康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对华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在吴廷康等人的建议和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随即依照苏俄党的规制,在党的外围成立一个青年团,成为“后备军”和“预备学校”。

另外一个例证是,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议案》,而2月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在团一大召开时即申请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因此,1923年8月团二大通过的《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的决议案》明确指出:“本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完全依照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关于共产国际与共产少年运动决议案’第五节之规定。”而这个第五节的规定强调,共产派的青年组织与共产党的关系,必须要有最大限度的统一及最严格的集中。共

产主义青年组织之责任便是服从这一政治的指导(党纲、策略及关于政治的指令)而参加总革命的战线^[1]。第三国际是由列宁领导的俄共(布)组建的,第三国际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自然是俄共(布)与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关系的扩大版。

二、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生成了以党带团、以团助党的格局

在中国,以党命名的政治组织的大批出现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政党,但不到两年便一哄而散了,而集会结社、组建团体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却得以延续下来。五四运动前后又出现了知识分子主导的研究性、思想性以及行动型等各类团体组织,如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觉悟社等。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这些社团大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弘扬民主科学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它们摆脱中国旧式会党的组织方式,实现了在传播新思潮基础上的联合^[2],成为新型政治组织之发端。如前所述,陈独秀就是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建立中共早期组织的;李大钊组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样依托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力量;毛泽东也是在新民学会的圈子内谋划建党建团的。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当月,陈独秀即选派党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他如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大抵相似。可以说,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更为年轻的中国共青团”。当然也有些地区,如天津、杭州、成都、南昌、太原是先成立了青年团,然后再建立党组织的。但这些青年团的发起,大多数是受了上海、北京等已建党建团地区的影响,或受其直接委派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政党组织发展的一个现实逻辑。

诚如中共二大决议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其“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党要联系民众,仅有党的自身组织还不够,于是便相继创建了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农会组织等。青年团与共产党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属于同根同源,因此,其在政治上与党的关系更为密切。由于早期团员人数众多,又是公开或半公开状态,便于在社会上开展工作,所以,早期党组织更多地是借助青年团的平台和力量。后来党组织逐渐壮大,发挥青年团的作用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两个政治组织的结构性联动在磨合中呈向好趋势。1926年共青团领导层就“C. Y 是 C. P 在青年群众中的一只手”的政治定位已达成共识。而党一旦发现某些地方出现“闹独立性”的“先锋主义”苗头,就会采取思想、组织等各种方法和手段加以解决,以保持党团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1949年之前的30年间,能够影响乃至决定民族命运的党派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代,国民党效仿俄共做法,也关注基层民众。但国民党人怕吃苦,一般不到基层去,基层工作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代理的。大革命高潮过后,国民党彻底丢弃群众。抗战期间,国民党意识到争取青年的重要性,因此有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诞生。由于三青团性质始终无法定位,后来就成为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争权夺利的一个焦点。因此他们的党团关系处理很糟糕,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虽曾兼任三青团的总团长,但却无法平衡各派系间的摩擦和牵制。1948年三青团被并入国民党内。

解放战争初始,中共为整合先进力量创立新中国而重建青年团。1946年8-9月间在延安召开的两次关于建团的讨论中,任弼时指出是否建团的核心问题在于:“现在党的领导强了,青年团不容易犯第二党作风的错误,但如不预防,也会闹成与党不和。”^[3]也就是说,通过这两场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范围内的讨论,初步预想和勾勒了新建的青年团与党在未来国家建构中的关

系框架。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明确规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坚决地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先进青年们的群众性组织。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非常重视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尤其是青年团作用的发挥。1950年4月，刘少奇特别强调：“为了使工会、农会、青年团成为新区社会改革的可以依靠的组织，各级党委必须十分注意加强这些团体的工作，特别是青年团应该成为党的最亲密的最可靠的助手，应该加强它的工作。”^[4]在刘少奇之后，分管青年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指出：“党现在是执政的党，团现在是执政党的助手，它和党是‘穿连裆裤子’的。青年团总不能离开共产党。”^[5]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恢复了“党同青年团关系”一章，着重强调共青团是执政党的助手。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对党团政治架构、党团机制关系有着深入思考和具体指导。从1952年8月到1953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多次专门研究共青团工作，与团的领导干部交流，既有方向性指示，又有具体方法传授。尽管“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政党政治出现畸形发展，共青团的领导完全中断，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在1969年4月，毛泽东希望共青团能重新成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并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整团问题。由于江青集团的严重干扰，整团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让江青集团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阴谋得逞。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党政治重回理性与常规。人民团体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又一次被凸显出来。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样，在执政党的政治文件中，在广大社会民众心目中，党员、团员常常被称为党团员，一前一后，中间是不打顿号的。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就指出，“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组织团员学习整党文件，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在实际运作中，“党建带团建”使党团关系在工作空间上进一步密切，“推优入党”使团组织向党组织输送新生力量成为制度性安排。在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80周年、90周年两次大会上，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都对共青团的功能价值做出高度评价，并对各级党委提出具体要求。江泽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共青团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党建带团建，把团的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规划之中。”^[6]胡锦涛指出，各级党委务必把青年工作作为一项带有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来抓，要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强调共青团要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党团如影随形、接续奋斗

清代晚期以降，帝制式微，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开始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在各种道路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动员社会的新生力量脱颖而出。这个一开始以五四青年为主体组成的政治团体，自然十分看重青年的重要作用，而通过青年组织向广大青年传递党的信仰、主张、政策与策略更为有效。在为民族复兴扫除障碍、铺平道路的革命年代，最初中共是不掌握军事力量的，主要工作就是发起群众运动。而青年工人、青年学生、青年农民等较之中老年更敏感于时代变化，更具改变现实的勇气和动力，因此青年团成为党开展工作的重要助手。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中共高层更加坚定地认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条运河，党必须通过这条运河，影响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并明确指出，党应处处积极指导团的工作，在精神物质上给予团帮助，争取广大青年群众的唯一条件是要注意他们日常的需要与斗争，用部分的要求、具体的口

号才能将革命的青年群众团结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周围^[7]。在解放战争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重建,就是因为仅靠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读书会等类形式的组织与活动,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先进青年积极分子的要求。而党在解放区青年群众中的工作,也因为缺少先进青年有组织、有系统的推动,常常流于松懈,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执政党看来,青年敢于向前看,生机勃勃,对社会主义抱有无限热情,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的上进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8]因此,党十分重视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力军地位,需要青年在工农业生产中尤其是艰难困苦环境中发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突击队作用。在这种带有浓重“青年崇拜”的社会氛围中,党要求共青团克服自己队伍中任何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倾向,努力使自己成为全体爱国青年的知心朋友和核心力量。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三大代表时强调,“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为达到这一目的,执政党要求团的干部要特别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大,要求每一个青年团员努力去帮助别人,而不要怕自己吃亏。在党的领导下,广泛积极地团结全国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助手和后备军作用。

青年群体是改革的天然促进派,执政党要借助这种力量推进改革开放,首先要激发并保护这种热情。“文革”结束后,中共重新开启现代化建设进程,调动与激发蕴藏在群众中的无限热情。在1979年国庆节的庆祝大会上,中共高层重申“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团体是广大群众的重要代表者”,要组织动员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一定要坚决维护自己所代表的群众利益,积极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切身问题。在随后展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中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支持它围绕党政工作大局、按照青年特点策划活动和项目,使它充分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真正成为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对中国青年和中国共青团寄予厚望。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年的热情和奉献。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高度重视共青团这一青年组织及工作,是因为青年群体不可取代的社会地位和对未来的决定性作用。政党是有生有灭的,而青年则生生不息。从社会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来看是这样,从人口资源的稀缺程度来看也是这样。中国青年作为新生力量,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与青年群体的关系,构成了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共产党的先进性与青年的先锋作用具有强烈的同向性。先进政党只有依靠广大青年,才能使事业发扬光大、薪火相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进步青年的政治志向、现实理想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实现,才能有所作为;广大青年需要以先进的指导思想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广大青年的切身利益需要通过先进政党来实现和维护。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是党的青年组织,其助手和后备军属性以及桥梁纽带作用非常明确。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在青年群众中传播政治理念,组织动员广大青年一起行动,同时通过共青团形成选拔青年精英的路径。所以,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作用的高度重视,自然也包含对共青团工作的更多期待。

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亟需党团从严治理、率先垂范

中国共产党是建构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领导核心,党的执政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

体现。在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一方面,执政党的各级委员会掌控着国家和社会事务运行的权力;另一方面,党风、政风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风气。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9]

进入 21 世纪,中国社会形态的多样化、碎片化、流动化和陌生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基层百姓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基于一定利益诉求和功能诉求的民间组织蓬勃而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和民间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开始重构。与此同时,互联网正在加速解构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动员方式,云计算使繁芜复杂的网络数据梳理和分析成为可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执政党整合社会的组织力量必然要走向多元,整合方式必然要实现直接路径与间接路径的密切结合。这种社会整合体系的变化,为党适应多样化社会发展,并在多样化社会中保持党应有的社会整合力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体制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在于使全党能够更好地应对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防范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使全党能够担负起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责任。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联系着蕴含无尽创造力且代表未来发展的青年群众。其功能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向青年传递党的意志,向政党表达青年诉求,影响党政决策,协调青年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问题是共青团的这些功能发挥得怎么样?在互联网时代能否获得预期效果?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从严治团由此应运而生。考察从严治团的对象及内容有三个维度。

第一,对团的干部从严治理。重在提升团干部的党性修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在新形势下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同时,加强团干部的作风建设,进一步提升他们密切联系青年的意识和本领,成为新时期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让走进青年成为工作常态和行动自觉。因为团的干部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要纳入从严治党的运作程序,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同时也要看到,共青团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团的干部不同于一般的党员干部,他们肩负着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神圣使命,应该走在从严治党的前列。

第二,对团员队伍从严治理。主要在于强化团员的先进意识,在普通青年群体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的各级组织要以团章为遵循,健全团内纪律制度,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制度,接受严格规范的组织生活锻炼,强化组织意识和组织纪律,引导广大共青团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当然,共青团是群众团体,要创造出适应团员特点的治理方式,不能完全照搬政党组织的做法。诚如邓小平在 1957 年指出的那样:“共青团的组织生活应该搞什么?团不同于党,党要更严一些,团不能像党那么严,但是,一定要过组织生活,也要有一定的纪律。”^[10]

第三,对团组织从严治理。重点在创新完善工作机制、组织形态和领导体制,扩大组织覆盖,严肃组织纪律,夯实基层基础,提升组织活力,不断增强团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使之能够在政治上和社会治理中更好地与党组织衔接。共青团作为党联系社会的中介性力量,只有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和口碑,才有可能产生持久的社会公信力和吸引青年的强大磁场。当前,要以从严从实的精神,认真开展“一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以团支部为基本单位,探索激发组织的

内在动力,将政治逻辑融入社会逻辑,围绕团员的生活、工作实际,开发社会资源,努力打造更多吸引青年、服务青年的战斗堡垒。

五、政治组织结构性联动成为增强政党整体性力量的必然选择

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权力运行走向弹性,多元合作成为趋势,公正成为政治过程追求的基本价值,共识成为政治运作与政治发展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超越政府行政、协调国家与社会利益的政治组织,自身建设成效能否取得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可和充分信任,影响甚至决定着政党功能的发挥。秦朝李斯提出“以吏为师”,西汉贾谊强调“民之治乱在于吏”,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社会管理阶层的思想作风和行为方式对普通民众有着强大的引导和示范效应。当代中国,党风影响民风,党内政治文化引领大众政治文化。“打铁还要自身硬”,为了适应世情、国情、民情的新变化,以及党员队伍自身结构出现的新特征,使党经受住“四大考验”,消除“四大危险”,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从严治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容回避的时代命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执政党整合社会的组织力量必然走向多元,整合方式必然走向直接与间接相结合,需要党的力量有一个综合性、整体性发挥。亨廷顿在衡量一个政党的制度化力量时,将政党组织的复杂性和深度列为三大因素之一。他认为,有力的政党组织往往与工会、农协等社会经济组织的联系十分紧密,因此具有较强的动员和领导能力。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联系着党执政最基本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向社会传递党的意志,向政党表达社会诉求,同时努力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共青团作为党的群团组织中政治性特征最强的一个,加强对团干部、团员和团组织的从严治理,深度开发共青团的吸引凝聚功能,既是提升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动员能力、服务能力与整合能力)的时代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与从严治党形成有机互动。

进而言之,在群团改革背景下加强从严治团,使团干部更像团干部,团员更像团员,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党的执政根基在社会和民众之中,党的各级决策机关必须以民众为根、以社会为本、以国家为用。而党在基层社会的全部工作和活动,即各个党支部的功能发挥,必须在机制上超越对政府行政一体化结构的依赖,在策略上要超越对政府行政资源的依赖。从长远战略来看,共青团改革要做的,也是在国家与原子化社会之间,不依赖于行政体系,而是通过基层组织和骨干重建社会中间层网络,密切联系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是“为党组织探路”也好,或者“让党组织有获得感”也好,都不为过。

[参 考 文 献]

- [1] 胡献忠:《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 [3] 《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页。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 [5] [10]《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23-324页。
- [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7页。
- [7] 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120页。
- [8]《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
- [9]《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 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3日。

(责任编辑:邢 哲)